

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

吴为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519066



519066

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

吴为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D/131/17

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

吴为章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2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1004-740-X/G · 385

定价: 16.00 元

序

胡裕树

在这部选集中，吴为章同志探讨了 80 年代以来话语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两个重要课题：广播电视台语言运用和句群分析。这两个课题都与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理解和预测紧密联系。其成果不仅对大众传播语言的研究和运用，而且对语文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可以丰富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

1988 年，我曾为汉语广播语体学的第一部专著：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作序，很为林君填补了广播学和语体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而高兴。事隔十年，我从收在这部选集的论文中，看到这门新学科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原有课题得到深化，研究范围更加拓宽，正在由“潜”到“显”，逐步成长；更是倍加欣喜。

选进这部集子的关于广播电视台语言的 6 篇论文涉及三个方面：《关于广播电视台语体研究的几点想法》是讨论方法论、方法的，《广播语言研究述评》则是对 1940—1990 五十年间研究历史的总结，其余的都是对本体某一方面进行深入探索的成果。我认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原则上都应该包括方法论和本体论两个方面；而一门学科建立之后，方法论、方法的探索、选择、借鉴、更新，则既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又是学科独立和日趋成熟的标志。在《几

点想法》中,吴为章同志从广播电视语体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研究课题的认识出发,提倡加强三种意识:多方协作、理论兼容和方法更新;对这三方面的论述则主要是围绕方法论、方法问题展开的。论文所坚持的语言和言语、结构和功能、语言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观点;所赞同的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归纳,比较,注重细致的本体描写,在归纳基础上的演绎,在“离境化”分析基础上进行“入境化”的分析等等方法论、方法;所提倡的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美学评判法、信息优化法、系统工程法、统计定性法、问卷调查方法、连续统分析法等;都是很有道理的。重视方法论、方法的探讨,对于正在酝酿突破的广播电视语体学,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这篇论文的价值。

《研究述评》把广播语言研究的 50 年历史划分成 5 个时期:萌芽时期(1940—1949)、探索时期(1950—1965)、停滞时期(1966—1976)、复苏时期(1977—1979)和发展时期(1980—1990);然后逐一概括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评述有影响的论著,并列举可能见到的论著及其出处。论文长达 3 万余字,可以说是一部广播语言研究小史。吴为章同志说,她当年写这篇长文,曾经查阅了 200 多篇文件、论文、文章和十部教材、专著;而写作的目的,一是为了庆祝人民广播事业诞生 50 周年,二是为了掌握学科发展现状,以利后来的研究。在进入某一课题的研究之前,先尽可能掌握、了解有关的资料,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避免重复劳动,有助于决定取舍,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得到最合理的使用;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优良学风。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述评》把发展时期列为专节,并用一半的篇幅来加以介绍,而且把评述的重点集中在理论的突破和方法的更新上。论文条分缕析地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这个时期广播语言研究在理论上的建树:原有课题的不断深化、新兴课题的积极开辟和相关理论的大力引进;对所列举的代表性论著的述评也比较细致,客观。在方法的采用和更新方面,论文提到了

比较的研究、归纳的研究和系统工程的研究三个方面。读过这篇论文之后,我认为它对于从事这一课题学习或研究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入门必读。

广播电视台具有教育、鼓舞、激励和愉悦人民的巨大作用,我衷心祝愿它百尺杆头更进一步。而从事业的发展来看,人才非常重要,从事广播电视台工作的人员,不仅应当是训练有素的学士生,还应当有理论丰厚、富于潜力的硕士生、博士生;我高兴地看到,北京广播学院正是这样一个培育广播电视台高级人才的摇篮。

二

吴为章同志是较早从事句群研究的学者之一。1982年提交给北京语言学会首届年会的《“语段”探讨》是她的第一篇关于句群的论文,曾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后收入《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又收入《句群和句群教学论文集》,新蕾出版社,1987年),引起与会者关注,并促成了她与田小琳教授长期的学术合作:她们曾在1984年出版《句群》(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近期又正在通力合作撰写《句群论》。从涉足句群研究起,吴为章同志就锲而不舍,一直关注这一课题,不断有成果问世。选进这部集子的专著和6篇论文是她在1985年以后发表的部分文字。专著《句群与表达》从应用的角度介绍句群的基本理论和运用条件,知识系统、深浅适度、用例丰富、可读性强;也有不少地方观察入微、发所未发。比如,第三章“句群的组织”从大量实例中归纳出句群内部句子和句子的接应方法有4大类:词语接应、句式接应、辞格接应和语意接应;前3类又各分为6小类,合计18小类。这是到该书出版的1988年为止所能见到的、最为完备的句群内部接应系统。又比如,第四章“句群的选择”,从语体要求和表达目的两方面讨论,也是富有理论启迪的。6篇论文和专著在内容上不相重复,

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一个问题，对专著进行补充，共同构成一个既有学术深度又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整体。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第六期上的论文《汉语句群研究的价值》，对句群这一语言单位在语言研究和语言运用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1989年，我在一篇谈对外汉语教学的论文中曾认为：就汉语的特点而言，句群教学更应当加以重视，因为它是养成学生语言能力必不可缺的环节；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习者能听懂成段的话，能成段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就必须进行划分句群的训练。现在，吴为章同志提出句群是“语法的最大单位、段落的组成材料、修辞的起码语境、话语的重要单位”，并把句群研究和广播电视台语体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思路。我祝愿她成功！

三

吴为章同志在1962—1965年师从一级教授方光焘先生攻读现代汉语专业语法理论方向研究生，受到方师严格的理论熏陶和方法训练；毕业后，她的主要兴趣是在语法的微观研究方面。她曾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汉语学习》等十几家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语法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汉语动词的“向”（或“价”）的系列论文影响较大，常被引用。为此，在祝贺她的《广播电视台语研究选集》出版的时候，我希望她在语法的微观研究方面、特别是动词研究方面的成果也能有机会结集出版。

目 录

序 胡裕树 (1)

一、论 文 部 分

关于广播电视语体研究的几点想法 (3)

铿锵悦耳 琅琅上口

——谈广播稿中语音要素的运用 (23)

语法分析和播音 (35)

广播电视节目词语运用十六条 (48)

语言学家对广播语言研究的贡献 (67)

广播语言研究述评

——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 50 周年而作 (72)

句群研究兴起的原因 (115)

解证句群的类型和作用 (124)

怎样组织承接句群 (135)

句群切分和播音 (139)

吴伯萧《菜园小记》句群分析 (147)

汉语句群研究的价值 (160)

二、专著:《句群与表达》

前 言 (179)

第一章 句群的定义 (184)

一 句群是大于句子的表达单位 (185)

二	句群和句子、段落及其他有关概念	(187)
第二章	句群的类型	(196)
一	句群的结构关系类型	(197)
二	句群的表达功能类型	(206)
第三章	句群的组织	(228)
一	句群的内部接应	(229)
二	句群的外部接应	(242)
第四章	句群的选择	(250)
一	根据语体要求来选择	(250)
二	根据表达目的来选择	(272)
第五章	句群与阅读、写作	(277)
一	句群与阅读	(277)
二	句群与写作	(283)
附录	主要参考论著目录	(288)
跋	(289)

一、论文部分

关于广播电视语体研究的几点想法

关于广播电视语言运用的探讨,可以说几乎是与人民广播电视事业的诞生同步的。

就广播语言运用而言,最早的特点探索,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的,目的也很实际,就是为了让广大的受众能一听就懂。比如,1946年6月制定的《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第四款“关于广播稿件的编写”第四条“编写的技术”规定了六条细则,其中涉及语言文字运用的有三条;1947年6月10日报的《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关于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第三部分“编辑的几点经验”有第八节“关于口语化”;1948年12月9日颁布的《新华社关于纠正新闻中滥用方言、专门术语、简称等的通知》最后说:“我们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因此,无论我们的逻辑,我们的造句文法,我们选词用字,都必须使人人能懂,然后我们所宣传的正确内容,才有被人接受的可能性。望此后发稿时切实注意。”上述这些文件,当时是指导广播稿编写的依据,后来则成为描写和归纳广播语言运用特点的蓝本。

1990年,笔者在撰写《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一文时,查阅了《广播业务》(中央广播事业局业务刊物,1955—19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学会刊物,1988.1—1989.12),1988年到1989年一些省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刊物[如《广播电视研究》(上海)、《广播电视业务》(山西)、《广播电视天地》(四川)、《北国视听研究》(辽宁)等],《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刊物,

1981—1990),《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1990)等杂志上刊载的近二百篇论文、文章,和视野所及的十部教材、专著。一个总的印象是:

(一) 1940—1979这四十年间,广播语言研究大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①1940—1949年,提出要适应“听”的起码要求。这个阶段能见到的文字主要是行政命令和工作总结,一般不以个人身份发表看法。②1950—1965年,肯定了广播语言运用的几项基本要求,即“通俗、口语、易懂”;探讨了播音的感情问题,读音标准和推广普通话的关系。这个阶段的文章,作者主要是在广播第一线工作多年的编辑、记者、播音员;也有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参与(参看吴为章《语言学家对广播语言研究的贡献》,《语文建设》1992年第5期),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出现了一个广播语言研究的高潮。③1966—1976年,停滞阶段。④1977—1979年,清除“帮八股”流毒,重申“通俗、口语、易懂”的基本要求,提出播音的“降调”问题。

(二) 1980—1990这十年间,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空气之浓、发表论著之多、探讨问题之深广、研究队伍之壮大,前所未有。这十年的广播语言研究,其特点大致可以作如下的概括:①传统课题得到深化。总结了广播语言的根本特点和基本要求,即“通俗化、口语化。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生动、形象、朴素”(参看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概括了播音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性质特点(参看张颂《朗读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归纳了一套“适听化”的方法(参看13所大学合作编著《应用广播学》,新华出版社,1988年);提出了探索广播功能语体的设想(参看施旗《广播电视语言》,中国广播出版社,1988年。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出版社,1989年。吴为章主编,牛印文、姚喜双编著《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②新兴课题不断涌现。紧接着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1980年10月)重申“自己走路”的方针之后,以广播界老前辈

左漠野同志为代表的广播工作者再度提出创建“广播体”——从广播特点出发、专为利于“播讲”和“收听”而编写的一种文章体载样式——的学术目标(参看左漠野《广播语言和普通话》,载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围绕这一目标,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课题,如各类广播节目的语言特点,播音口语化、生活化、形象化,播音风格,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运用等。^③相关理论大量引进。这十年间,有不少论文引进语境理论、模糊理论、意境理论,以及有关冗余信息、大脑机制、认同心理等等相关学说来探讨广播语言运用的要求和特点,呈现出一派“思想解放”的新局面。^④研究队伍空前壮大。这个时期的文章作者除了在广播电视台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少数语言研究工作者之外,大量的是高等院校的现代汉语、新闻写作教师以及他们指导的部分硕士研究生。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1978年5月1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标志着人民电视事业的诞生,也标志着电视语言运用的开始。电视语言的研究是萌芽于电视解说词的写作的。婴儿期的电视视听艺术,首先要解决的是解说词的写作以及解说词和画面的关系问题,人们提出了“声画合一”、“声画对位”的解说词分类,探讨了解说词对于画面的种种配合作用。在研究和讲授解说词的写作中,对于有声语言的运用,一般都主张遵循广播稿件写作、编辑中的语言要求,很少有新的看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关注这一课题的人,主要是在第一线的电视工作者和相关院校(如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并且在“解说词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这一问题上耗费了不少笔墨。不过,在争论过程中,对于电视解说词的特点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提出“依附性、跳动性、零散性”是电视解说词的基本特征等看法。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电视新闻的播音问题,看法比较一致,主要观点已写入《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随着电视主持人节目的迅猛发展,一些主持人节目成为名牌(如《正大综

艺》、《综艺大观》、《东方时空》等),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运用研究也开始引起重视,已经有一批学术论文发表;在一些知名主持人的谈艺性论著中,也有不少篇幅论及语言运用的甘苦。更为可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下半年起将开辟“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语言运用”专栏,这必将大大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我们认为,广播电视语言的研究可以区分为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研究是把广播电视语言现象看作一个独立的功能语体系统,对它的研究旨在建立一个语体学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语体学;低层次的研究是在广播稿件和电视解说词语言运用特点的探求上,以归纳若干区别于报刊文体的运用特点为目的,旨在指导广播电视稿件(包括“主持人节目”串词或主持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的写作和编辑。广播电视语言研究的两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的,低层次研究是高层次研究的第一步和必要基础,高层次研究则是低层次研究的抽象概括和理论升华。

就199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看,广播电视语言研究基本上还处在低层次阶段,1991年以后问世的研究成果也还没有迈出多大的步子。我们正面临着如何深化和创新的局面,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广播电视语体学,以便更自觉地运用语言,为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水平服务,为维护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规范出力,为发展当代语言科学作贡献。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众多同人应当增强下述三种意识:多方协作意识、理论兼容意识和方法更新意识。

一 增强多方协作意识

笔者于1995—1997年间曾有机会先后参加三次有关广播电视语言运用的专门会议。这三次会议的与会者,有电台、电视台知

名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有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有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和个别在校硕士研究生。大家的共同感觉都是：相见恨晚，早就应该有这样的沟通和交流了！作为一名与会者，笔者除了感受交流的教益和欣喜之外，也萌生了一些想法。

（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道无形的墙把原是亲密战友的几部分人隔离开来——

从学术活动看，语言学方面的会议，很难见到在广播电视台第一线上的工作者参加，广播电视台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同样很少有语言研究工作者参加。这种“隔离”，最明显的表现是：语言学界的刊物上难得见到关于广播电视台语言研究方面的文章；同样，广播电视台界的刊物上也很少刊登介绍相关语言理论成果的文章。

就人员情况看，从事语言基础理论研究或教学的人对于广播电视台语言的运用现状或关注不多，或无缘参与；从事广播电视台语言应用实践或教学的人对于当代理论语言学的进展情况或了解甚少，或视为无用——

60年代中期曾经批评过的“把语言和言语割裂开来”的现象、70年代以来力图纠正的“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对立起来”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克服，而且似乎愈演愈烈了。在广播电视台系统内部，专业和基础、应用和理论的鸿沟，也不是不存在的。比如，频频召开的各种名目的广播电视台节目评比会议，极少邀请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委；甚至在语言学内部，也存在着重应用轻理论的矛盾问题。

这种应用和理论对立、分工即分家的偏颇，妨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延缓了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出现了某种误解——仿佛语言学工作者是交通警察，而广播电视台工作者则是来往行人。结果，大家的思路都放不开，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也就难免打折扣。笔者就曾在一次业务座谈会上听到一位深得受众欢迎、也的确很有心得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听各位专家们的

意见的。”而据我所知，参加那次会议的“专家们”却是诚心诚意想听听在第一线的人的意见的。

(二) 人们早就不满意上述那种画地为牢、各自为战的现象了。从90年代初，就有人走出广播电视台的大门，打进语言学界，参加语言学界的活动，重视把理论转化为应用；而语言学界的人也盼望对广播电视台有更多的了解，以便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更富于指导意义或能够直接转化为应用。有人撰文呼吁“搞广播电视台语言研究需要高素质高层次的合作，搞一切项目稍大的科学研究都要高素质高层次的合作”(参看周洪波《广播电视台语言：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天地——喜读牛印文等〈广播电视台语言应用〉》，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1期)。事实也证明，凡是实践了多方协作的，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91年以来出版或发表的一批论著，比如姚喜双《播音风格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林兴仁《广播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94年)、吴郁《主持人即兴口语特点探讨》(《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和《主持人语言个性的层面分析》(《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等，都是多方协作的成果。

我们所说的多方协作，既指分别属于不同学科的多人的齐心合作，比如《广播电视台语言应用》是分别属于广播电视台新闻学、播音学、语言学三个学科的三个人合作的成果；也指一个人通过全面的理论学习、丰富的工作阅历、诚恳的学术交流、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吸收借鉴，从而获得的多学科的知识积累，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位学者都属于这一类。其中，林兴仁，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毕业，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修辞学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分配至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至今，他本身就体现了多学科、多方面的协作。再如吴郁，先后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老师，中间曾做过几年专职的播音员。现在，除了完成本职的教学工作之外，她一方面与广播电视台第一线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参与主持节